



诗化哲学：T·S·艾略特研究

Poeticized Philosophy: T. S. Eliot

江玉娇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荒花哲思》T·S·艾略特研究

江玉娇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化哲学: T·S·艾略特研究 / 江玉娇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309-07259-4

I. 诗… II. 江… III. ①艾略特, T·S·
(1888~1965) — 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449 号

诗化哲学: T·S·艾略特研究

江玉娇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查 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69 千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259-4/ I·546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Book's Complaints

You keep my face clean;

My heart feels lonely;

You let my mind lone;

My head turns clumsy.

Jiang Yujiao

Acknowledgements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dissertation for the doctor's degree. So, I should like first to thank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Shi Zhikang, for his wisdom, intellect, and critical acumen which have been guiding this dissertation from its inception to its completion, for his close-reading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which have enabled me to finish it, and also for his instructive and witty lectures which have greatly benefited my understanding not only of T. S. Eliot but also of life. Besides,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Li Weiping for his acute criticism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which deepened my insight into T. S. Eliot's profundity, and also to Professor Yu Jianhua for his academic mind which notably facilitated my work.

Thanks are also due to Professor Li Guicang whose creative and critical mind enlightened my later improvement.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Professor Liu Yan for her practical help and enduring encouragement over quite a few years since I worked on *The Study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Waste Land*, and also for her astute criticism and invaluable advice from the initial writing to the final revision of the book. Particular thanks should also go to Professor Xiao Jian-An and Professor Liu Lihui for their hopeful encouragement during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s of my

study.

I am greatly indebted to my friend, Qiao Longbao, for his smiling helps at the emergent moments, and also to my friends, Ou Yang and Fan Toujiao for their materials.

I deeply appreciate the materials from the Library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 owe a great deal t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for her funding the book through a special program.

Great thanks should also go to all the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f T. S. Eliot, which supplied me with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academic support.

中文内容提要

《诗化哲学：T·S·艾略特研究》主要探讨艾略特（1888—1965）的“秩序理论”，如何从哲学领域转化、运用、实践到其诗学、宗教、文化、社会与创作之中，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秩序理论”是T·S·艾略特众多理论中的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核心学说之一，它是理解艾略特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诗学理论和创作活动的重要线索。对各种“秩序”的探讨贯穿了这位“诗人哲学家”的一生：从孩提时候的“神秘幻觉”；“结束小姐与开始先生结婚”；“上先生与下小姐私奔”（Ackroyd 22），到年老时的“上升的路就是下降的路，向前的路就是向后的路”；“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CP “Four Quartets” 189, 210, 221）。但一系列有关秩序理论的正式出现是在艾略特的博士论文《认知与经验：布莱德利的哲学研究》（1911—1916年完成，1964年出版）中，后来完善于他的诗学和戏剧理论中，并在他的创作中得以印证和实践。艾略特的秩序理论既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与宗教的探讨，也是一个诗学和创作的具体实践过程。艾略特一生在“思”与“诗”之间的不断求索中艰难地摸索着，从哲学秩序到诗学秩序，从宗教秩序到伦理道德秩序，从文化秩序到社会秩序，从世俗秩序到非世俗秩序，最终找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秩序”。

本研究采用对话的形式，从哲学视角阐释了T·S·艾略特的“秩序理论”的发展历程，其“秩序理论”既包含对立面的对

话,也包含统一面的对话,对话最终追寻的是一个统一谐调的“秩序”。但它们并非表层的现实对话,而是表达了一个隐形的艰辛探索。这个艰辛代表着被研究者的“秩序”是“一个痛苦的黑暗探究”(Jain 205)。正如艾略特本人所以为的:“灵魂的生命本身并非拥有一个固有的统一体”,而是我们在为它们执行“一个痛苦的统合各种互为冲突的任务”(KE 147)。通过建立一个理念上、艺术上的社会秩序,艾略特让诗学承担起了危机四伏的现代哲学的使命,为在生命之轻中漂泊辗转的现代人重新寻回生命的根基。正如李维斯所说:“二十世纪中期,英美的传统批评源头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现代社会的哲学和宗教将会被‘诗学取代’,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美国的诗人、戏剧家、批评家,T·S·艾略特”(Selden 13)。艾略特用自己的诗思和生命体验筑建起意义丰盈的世界,让我们在与他那些作品赤诚相间的瞬间,经历彻悟和感动。他用那束玫瑰花渗透我们生命的光芒:“一个极其单纯的境界/……烈火与玫瑰合二为一/一切将平安无事/宇宙万物将平安无事”(CP “Little Gidding” 222-3; 赵罗蕤译 179)。艾略特是通过有智性的、有智慧的、有传统意义的秩序的追求,重建生命世界的统一体,重新召回人类存在的原始本真:“谦逊是道成肉身最原始、最好的体现和智慧的化身”(FLA 14-15)。

本研究通过艾略特的“传统观”、“非个性化”、“客体关联物”(注:本作者以为“objective correlatives”应译为“客体关联物”,而不是“客观对应物”)、“情感统一说”的理论溯源,并结合对艾略特成长过程中受影响的作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及人类学家的思想,对艾略特的秩序观作了全方位的探讨,归纳了其秩序理论中的四个重要模块。第一个模块:“哲学视角下”的秩序包含两种模式——“认识论视角下”的秩序和“方法论视角

下”的秩序；第二个模块：“诗学视角下”的秩序隐含两种模式——“语言视角下”的秩序和“心理视角下”的秩序；第三个模块：“文化视角下”的秩序包含了三种模式——“宗教视角下”的秩序，“伦理道德视角下”的秩序以及“文化视角下”的秩序；第四个模块：“社会视角下”的秩序模式。每一组秩序的对立面及其统一面都是在具有智性维度和传统价值的“更高的有限中心”寻找统一和皈依的产物。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序言”包括五点：第一点指出了许多人对艾略特的三个误读。第一个误读是有人认为“非个性化”和“客体关联物”理论是艾略特首先提出的；第二个误读是有人认为这两个理论是艾略特在其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和“哈姆雷特与他的问题”（1919）中提出的；第三个误读是有人认为“非个性化”和“客体关联物”仅仅是艾略特的诗学批评理论，是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契合论”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消极感受力”诗学理论的影响而提出的。事实上，除“非个性化”、“客体关联物”理论外，艾略特还强调了“智性”、“理性和非理性的调和”、“情感统一”等概念的重要性。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曾经细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了解到柏拉图的“理念论”：智性的客体就是理念。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艾略特已借用了这些哲学术语，后来又巧妙地借用到其诗学研究。人们对艾略特误读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人们只知道艾略特是诗人、文学评论家而不了解其哲学思想；第二，人们只研读艾略特来到英国（1914）以后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很少有人读过他的博士论文以及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第三，在中国，艾略特的博士论文《认知与经验：布莱德利的哲学研究》，《信奉异教神祇》（1934），《远古与现代研究》（1936），《基督教社会理念》

(1939),《文化定义札记》(1948),《对批评家的批评及其作品》(1965),以及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研讨报告,还有许多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至今没有汉语版,而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我们理解艾略特的哲学思想及其后来的诗学、宗教、文化社会等等理论的发展渊源有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艾略特的思想本身就是哲学、诗学、宗教和社会学相交融的“有机秩序”,其中哲学是他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文学批评理论的铺垫,是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道路上走向辉煌的导航,尽管他是因诗作流芳百世。对艾略特的诗学与诗歌的理解和研究离不开他的哲学思想,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哲学家”(Abel 2006)。艾略特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都是探讨哲学问题。他一生从师于许多世界哲学名师,如欧文·白璧特、柏格森、罗素、劳伊斯、烂慢、伍德斯等等。研读过多位哲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家的著作,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布莱德利、涂尔干、莱维·布吕尔、弗雷泽等等,这些学者对艾略特的“秩序”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素、布莱德利、柏格森、欧文·白璧特、弗雷泽等。艾略特聚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于一身,一直在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寻找生命秩序和灵魂皈依。艾略特的秩序理论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同时又在其作品中得到升华,表现最突出的有《疯狂的夜晚》(1911)、《情歌》(1917)、《荒原》(1922)、《灰星期三》(1930)、《合家团圆》(1939)、《四个四重奏》(1944)、《致妻子》(1959)。这也是他一直主张理论与创作相结合的缘由所在:“诗人的理论更源于他的创作实践”(OPP 42)。

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关于国内外艾略特的哲学与诗学、创作关系的研究现状。到目前为止,国外除一些论文的分析外,有四

部相关研究专著(尚无汉语版):弗里德(Lewis Freed)的《T·S·艾略特:哲学批评家》,于1979年由普渡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认为艾略特的哲学思想受益于布莱德利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斯伽佛(William Skaff)的《T·S·艾略特哲学:从怀疑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诗学,1909—1927》于1986年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从哲学视角探讨了艾略特怎样从怀疑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T·S·艾略特和批评哲学》,于1988年由吉拉德·大科沃斯有限公司出版,此书认为罗素和亚里士多德影响了艾略特的哲学思想;蔓菊·简(Manju Jain)的《T·S·艾略特和美国哲学:哈佛大学时期》,于199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探讨了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所受过影响的哲学思想以及艾略特所表现的哲学思想。这四本专著对本作者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和启发。这些研究成果普遍认为艾略特是一个一元论者(Allan 172; Freed 30; Frye 34; Leavis 180; Shusterman 47; Stead 48; Tate 234; Blackmur, “T. S. Eliot: From ‘Ash Wednesday’ to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203-4)。本书以为艾略特是一个追求多元统一的“诗人哲学家”。

与此相关,在中国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教授在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的论文“艾略特在西方——艾略特评论史述评”中指出:“‘艾氏’分析的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侧重艾略特的诗歌文本研究;下半叶主要转向艾略特的诗学与文化研究”。十年后,四川外国语学院董洪川教授在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的“中国当代T·S·艾略特现状及走势”论文中在详细地归纳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研究以及《荒原》、《四个四重奏》、《情歌》的研究后,指出了艾略特研究的走势:“我国艾氏研究中仍有诸多

‘盲区’,如艾略特的戏剧、社会文化批评以及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和对新文学的贡献等问题,我们仅有零星成果……以及艾略特的政治倾向等问题,我们还几乎没有涉及”。本作者以为近几年已进入了艾略特诗化哲思的探讨阶段。如,西南大学刘立辉教授的论文,“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文体特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涉猎了《四个四重奏》的哲学背景的探讨,其另一篇论文“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引语解读”(《国外文学》,2002年第3期)详细分析了艾略特基督教化的逻各斯话语与诗化哲学的智慧和理性融合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浑然一体的诗性效果;湖南师范大学蒋洪新教授的“论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时间主题”(《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在分析艾略特的哲学时间观和宗教时间观方面给了读者一条清晰的思路;深圳大学徐文博教授的“《荒原》诗序变易的认识论观照”(《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了这首被人们称为“世纪之诗”的创作理据;史成芳博士的“无常与永恒之间——《四个四重奏》的时间编码”(《国外文学》,1993年第4期)结合伟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新柏拉图式的时间观分析了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所表现的时间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陆建德教授的论文“艾略特:改变表现方式的天才”给我们暗示了艾略特的哲学思想对他的创作的影响,此论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教授的专著《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对我们研究艾略特的哲学思想颇有启发。本文作者于2002—2004年完成了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荒原》话语模式研究”,撰写了专著《〈荒原〉话语蕴藉研究》,于2005年4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2005—2008年期间,完成了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T·S·艾略特

的诗化哲学研究”，2008年5月份完成了博士论文《T·S·艾略特诗化哲学思想——“秩序”理论批评研究》。此论文构成了本专著的主干部分。近十年的努力使本书作者对艾略特的作品、诗学理论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较丰富的研究底蕴，对艾略特的哲学思想亦有初步的了解。如论文“探讨 T·S·艾略特的‘秩序’理论”（《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从宗教的视角上得出艾略特的“宇宙秩序”观是世俗和非世俗相交融的统一体，成为本研究选题的开端；发表在2005年第4期《国外文学》的“T·S·艾略特的自我意识本体论”是对艾略特秩序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这些成果为本文作者继续对从哲学视角全面地阐释艾略特的秩序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点关于艾略特秩序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本研究力图消除多数人对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和“客体关联物”导致的一系列误读，如：艾略特一味地崇尚“非个性”，主张“客体化”，追求“古典”，反对“浪漫”等等说法具有重要的澄清作用。它进一步说明“非个性化”和“客体关联物”理论是艾略特诗学理论中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其目的是追究一种更深远的宇宙化的“永恒”和“秩序”，此秩序包含了“具体”与“抽象”的统一、“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个性”与“非个性”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浪漫与古典”的统一、“宗教与社会”的谐调、“个体”与“群体”的融合、“上帝”与“人类”的和谐、“生”与“死”的循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文学”与“传统”的一致等等。其最终目的是为这个疯狂、无序、混乱、浮躁的现代社会设置一个具有智性的“宇宙秩序”，并使一直以来西方理论界中“主客”分离的二元倾向得以弥合、统一。艾略特的秩序思想是追求形而上的一种理念秩序。

第二章“哲学视角下的秩序”含有两种模式：“认识论视角

下的秩序”模式和“方法论视角下的秩序”模式。前者从艾略特后期的诗学散文到他早期的研讨会上的哲学论文以及其博士论文,追溯了“客体”与“客体关联物”的溯源,阐释了艾略特怎样消解“主体”和“客体”、“过去”与“将来”、“内在”与“外在”、“实体”与“理念”四组二元对立的矛盾,使其互为统一,共存一个秩序中。艾略特认为情感、印象和记忆都是感知客体,所以它们能消解“主客”二分的对立,融之为一体,在此,“主体”是“客体”的主体,“客体”是“主体”的客体。此外,诗人的“世界”是一个情感统一的“有限中心”,在这个“有限中心”里,“主体在对优秀艺术作品感知的经验和智性中与其得到融合”(KE 141-2)。在艾略特的一生中,他一直在寻找客体来统一“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掩盖个人的有限情感。“内在的不安”和“外在的冲动”是在客体的感受、转化过程中,在“心理有限中心的直接经验中”,“得到调整,保持一致”(KE 15-16)。艾略特受劳伊斯的“理念主义”和布莱德利的“绝对理念”的哲学思想影响,又融合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观,综述了“实体”与“理念”在“有限中心”的统一,其中,“理念”受“实体”的限制,其本身就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理念”所指的“实体”是一个理念的实体,它通过“思想”把世界各个表象整合为一体,但它又必须依靠思想而存在,“因为世界是完整实体或者完整的理念组成的”(KE 3, 35, 57)。尽管艾略特深受他们的思想影响,他有别于他们:艾略特不是绝对的一元论理念主义,而是一个追求多元统一的理念主义者。在时间统一方面,艾略特受柏格森“记忆”思想的影响,认为个人的无意识是一种永恒绵延,一种感觉——在场的感觉经验是由从记忆中带入过去的感知组成,同时也是一个从个体无意识到集体历史无意识所建构的种族记忆的过程,在其组合的过程中,“现在”是“过去”与“将来”的“有

限中心”，为时间的循环构成秩序。艾略特是一个追求多元并存的哲学家，他把四组对立矛盾统一在“认识论视角下的秩序”中。

“方法论视角下的秩序”模式含有四个统一：“个性”与“非个性化”、“理性”与“非理性”、“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批评与审美”。它论述了艾略特怎样使前三组对立在“有限中心”得到统一和后一组得到谐调一致以及其内在关联，修正人们通常认为艾略特是一个提倡“非个性化”、“理性”、“古典主义”的一元论者。进一步论述了刘燕教授在其专著《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中提出的思想：“艾略特提倡多元化批评理论”，并“试图通过一种具有张力的‘辩证统一’的方法”为它们建立了一个理念上的统一秩序（Liu Yan 5）。艾略特主张把个人经验转化为非个性化、陌生化，借用有意识的经验不表达私人情感，而表达无意识的倾向，把主观愿望变成共性或普遍性，使之融入“有限中心”中的非个性无意识中。此外，艾略特认为经验中的情感是个人的、非理性的，创作中的情感必须是非个性的、理性的，非理性、个性、混乱的情感应该要转化成理性、有序、非个性的诗歌情感。也就说把个人经验转化为社会经验或诗性经验，使之具有共性、具有智性，具有艺术效果，从而掩盖个人情感。在“审美理想”与“批评功能”的关系中，艾略特认为审美理想追求的是秩序、逻辑、和谐、智性、感情适度，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它必须与文学、宗教信仰保持一致，因此，它不是一种狂热而是一种有限制的“快乐”。“批评功能”则主张情感客体化、主观客观化、个性非个性化，两者保持高度一致达到智性的维度。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上，艾略特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崇尚古典、反浪漫。其实，他强调置“外部声音”与“内部声音”于智性的统一体中，在此，古典

主义的理性思想和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因素在“有限中心”都得到克制和调和。艾略特受罗素的思想的影响:“世界有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是由各种对立面的融合而成;‘万物源于一,而一源于万物’;然而众多实体远不如一,一是神”(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41)。

第三章“诗学视角下的秩序”包含两种模式:“语言学视角下的秩序”模式和“心理视角下的秩序”模式。前者拥有两个统一:第一个是“词与概念”之间的统一,其要求是用精确的词把抽象概念具体化,让两者在感觉经验中同时客体化和智性化,从而求得统一。最后使诗性效果达到:“在感觉的指尖上摸到智性”;“感觉他们[玄学派]的思想就像立刻闻到了玫瑰花的香味”,这就是诗性“内外张力融为一体”的体现(*SE* 209, 210, 287)。艾略特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在诗学中把概念具体化是实现‘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的方法”。第二个是“词与词义”之间的统一,在此,艾略特强调不但“诗学批评而且诗学本身都应把词义具体化,赋予意义精确、严谨、明确,避免模糊、笼统、不确定”(SW 78; Freed 148),否则会导致“语言死亡”(SE 327)。词与它的意义在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有继承性作用,所以,它们在相互渗透、相互赋予意义时能构成一个文学秩序,赋予语言永恒的生命。因为“具体的词义能代表一个美德”(SW 39),“能阐释基督道义”(ICS 10)。此外,“语境的变化会扩充词义”,也正是“这种变化才使得语言永恒”(TCC 74; Shusterman 74)。词义所依靠的语境能保持词汇意义的扩大和更新语言的秩序。艾略特的最终结论是哲学如同诗学,其思想也应该要客体化、智性化,“因为哲学和诗学中用词含糊、无所指,那么它们会脱离现实”(Skaff 158)。艾略特此观点也受益于布莱德利的“有限中心”(the finite center)理论的影响:诗人和哲学

家的“世界”是个“有限中心”(KE 147),它展示的是感觉经验下的精确以及智性与情感的统一秩序。

第二种秩序从心理上首先阐述了“词”与“客体”怎样结合在一起,然后阐述“客体”与“感性”怎样相互移注,最后论述“情感”与“智性”应怎样才能保持一致,不脱节。对艾略特来说,“词”是情感思想的符号;情感思想是“客体”的符号。“词”与“客体”不依赖于情感思想,但是,思想依赖于“词”与“客体”。“客体”的内在的象征功能把“词”与“客体”融为一体。一切事物始于知觉,终于知觉。即:客体刺激感官,感官做出反应,获取信息,然后传递信息给知觉;知觉进行消化,然后把消化过的信息传递给感受;感受把信息转化成思想、想象或情绪。整个信息转化过程是一个“感受”过程,“感受”使它们在“有限心理中心”得到“高度智性化”,并使它们“保持直觉的统一”(SW 4, 7; KE 16)。因此,情感的统一是指思想与情绪的统一、理念与智性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艾略特此思想不仅仅体现布莱德利的“有限中心”思想,还有柏拉图的“理念一致”原则的参合^①。在“统一的情感”中,“智性”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体现出细致和周密,并“能使过去隐形的内容在心理活动的秩序中显现出来”(KE 27),进入“道德维度”,用心理理念来维持社会秩序(ICS 10-16)。

第四章“文化视角下的秩序”含有三种模式:“宗教视角下的秩序模式”、“伦理道德视角下的秩序模式”和“文化视角下的秩序模式”。

“宗教视角下的秩序模式”探讨了艾略特的“神秘主义与怀疑主义”的统一性,“宗教与哲学”的互补性,“上帝与人类”的协

^① <http://classics.mit.edu/Plato/republic.1.html>